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189期)

本期要目

- 逃离鼓浪屿
- 网上预约售票实现景区限流
- 赣闽携手保护“大武夷山”
- 智慧旅游带给我们哪些全新体验？
- 世界遗产，如何善待？
- IUCN研究表明非法捕杀等活动威胁世界自然遗产
- 让人回归和体验自然——德国国家公园扫描

2017年7月2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逃离鼓浪屿	-----3
网上预约售票实现景区限流	-----7
扬州景区给共享单车“上规矩”	-----11

新闻摘要

赣闽携手保护“大武夷山”	-----12
法开署贷款项目实施 助力仙居国家公园建设	-----14

社会纵横

智慧旅游带给我们哪些全新体验？	-----15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双刃剑	-----17

时事评论

世界遗产，如何善待？	-----19
建立“国家公园”会遇上哪些难题？	-----21

世界遗产

IUCN研究表明非法捕杀等活动威胁世界自然遗产	-----25
古今辉映的“世遗”之城——克拉科夫	-----25
柬千年古迹三波坡雷古入遗 游客大增	-----27

环球博览

让人回归和体验自然——德国国家公园扫描	-----28
---------------------	---------

逃离鼓浪屿

【新周刊2017年7月11日】两个多月之后的十一黄金周，厦鼓码头可能会迎来近年最多的游客，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登船，抢在拉闸限流前登上鼓浪屿，一睹“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随着7月8日鼓浪屿与可可西里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达到了52项，仅次于意大利（53项）。可想而知，未来这个头衔还会为鼓浪屿带来更多的游客和商机，连当地学者都呼吁设立“鼓浪屿学”。

对早已过度商业化的鼓浪屿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是解药，还是催化剂？

多年来的商业开发，已经把鼓浪屿原有的社会形态和产业形态都改变了。原住民陆续搬走，原有公共机构因为需求不足而被裁撤。现有公共设施则难以应付大批游客，公厕门前常常大排长龙。游客密集的区域也容易发生窃案，据论文《旅游型海岛的犯罪现象：鼓浪屿案例研究》显示，2009-2013年鼓浪屿六成犯罪是扒手对游客盗窃财物。岛上住宅的租金年年看涨，流动人口唯有租住在商业区，进一步造成商业区越来越拥挤嘈杂。整治前的龙头路，跟中国各地的历史街区没太大区别——满街都是烧烤鱿鱼味。

申遗成功后，鼓浪屿的治安理想必会得到加强和改善，按“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变得干净整洁起来，衰败的建筑也将焕然一新。只是，那些搬走了的人，可愿意搬回来？

为什么人们不愿住在鼓浪屿？

作为中国曾经的两大公共租界之一，鼓浪屿岛上建成的外国领事馆、华侨、官僚、私家庄园等建筑共有60万平方米，约1200幢，曾被冠以“万国建筑博览会”“海上花园”“钢琴之岛”等美誉。由于长期处于非正常使用状态，很多老建筑年久失修，几成危房，如果只考虑使用功能，这些有过辉煌历史的老建筑，几乎成了负资产。

鼓浪屿也许是全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方，其人口结构的各项指标都

远远超出了老年型社会，是个超老年型的小岛。站在鼓浪屿岛的最高点日光岩上往下看，很多老房子都有风雨飘摇的残破之相，为这个著名的小岛平添了几分衰败之气。

穿梭在岛上的小巷之中，看着那些荒草丛生，或是堆放着各种杂物的老房子、老院子，会让人感慨光阴的力量。这里，在它的鼎盛时期，曾是中国顶级的豪宅区。

人口减法

在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中，75岁的傅先生说自己是里面的年轻人。他们中最大的90多岁了。在雨后的夕阳里，他们彼此用当地话拉着家常。“人人有本难念的经。”傅先生感慨地说，他的5个子女都在厦门市或外地，留在岛上的，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其他老人也大多如此。对于岛上的原住民来说，这里，是一片夕阳红。

“晚上7点以后，走在鼓浪屿的小巷里会有点害怕。太安静了，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现年57岁的董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在他的记忆里，他小时候（五六十年代），小小的鼓浪屿岛容纳了3-5万人。但如今，这里的常住人口不到16000人。

10年之间，鼓浪屿的人口以不可控制的速度在逐年减少：从前的6所小学，如今只剩下一所；原本有三家医院，如今只有一个卫生所。原先的四个居委会如今合并成了两个——老人们淡然看着岛上的一切变化。“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年轻人都去市区了。”

曾任厦门市规划局局长的赵燕菁记得，当年他为厦门市政府所作的整体规划里，曾提出鼓浪屿要做减法。“那时候鼓浪屿岛上的单位特别多，工厂、学校，各种行政单位，五脏俱全。当时鼓浪屿的人口是两三万人吧，我们的规划是想减到一万到一万五。现在已经达到目标了，但现在有更多的人在不断地往外搬。”

时隔几年回头看，赵燕菁认为当年的这个“疏解岛内人口与工业”的方针虽然符合当时的发展需要，但却过于粗糙，有失片面。“随着我们不断地做减法，把各种单位和设施都搬出来，这种趋势到了一个点会不可逆转地发生恶化，因为这把它原来整个一个社区的生态破坏掉了。”

事态已经开始朝着他们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而去：几年间，不断有年轻

人向厦门市区搬迁，鼓浪屿人口减少，已形成了一种加速度停不下来了。

鼓浪屿应该留下什么人？

对于鼓浪屿的年轻一代来说，没有了工厂和就业岗位，学校、医院、娱乐设施都越来越少的鼓浪屿，与他们渐行渐远，而厦门市区，却和他们的生活越来越近。2006年，厦门市政府要为市民建廉租房，当地一份报纸提供的一份数据是：鼓浪屿岛上竟然有700户居民提出了申请。

被人注意到的是，厦门市规划局和管委会有关人员描述鼓浪屿的发展时，总是把吸引“高端”游客，留住“高素质”本地人挂在嘴边。“高端”和“高素质”是他们想打造的鼓浪屿环境与居民面貌的关键词。“鼓浪屿不是只能‘一日游’的观光景点，历史赋予它无数丰富的细节和文化内涵，使它如同一件精致的古董，欣赏它，需要一定的品味、足够的耐心和充裕的时间。”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曾向厦门市规划局提交过一份关于鼓浪屿的规划研究和策划书，其中明确提出：“尽量弱化鼓浪屿与风景名胜区的关系，弱化鼓浪屿与观光游的联系，要重新思考鼓浪屿的定位。”

这份规划给出的鼓浪屿的定位是：基于鼓浪屿岛的地理和历史特色，以及岛上福州大学美术学院的作用，将其定位为服务于全国的高档住区和特色度假社区、历史街区与艺术之岛。

“鼓浪屿是天生的贵族。”规划书如是给鼓浪屿定性：“在今后的建设和项目安排中全面瞄准国际上最顶级的别墅区和度假区，使每个中国人都认为在鼓浪屿拥有住宅，能够定期在鼓浪屿度假才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这才是鼓浪屿价值的真正回归。”

事与愿违。随着岛上人口的剧减，鼓浪屿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原住民中的高收入群体逐渐搬离了鼓浪屿，而将老房子留给了低收入人群和流动人口。“这种变化让人担忧。”厦门市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称。

“如今的鼓浪屿岛上，低保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17.7%，远远高于厦门市平均水平的3.1%。”

曾经，迎接游客的，是拥有100多个音乐世家的音乐之岛上的钢琴声；今天，上岛后的游客要遭遇的，却是拉客的导游和商贩。在鼓浪屿岛上的1万多人口中，有4000左右是外地人，其中以安徽和四川人为主。精明的安徽

人把持着岛上的商业，从导游、照相，到海鲜、干果、茶叶店，都是他们的天下。四川人则从事着搬运、建筑等体力工作。

种种迹象表明：鼓浪屿已经从人们记忆里的上流社会（汇聚了全国最多名人、最多有钱人、最具艺术气质的小岛）演变成了社会经济问题复杂、老龄化严重的“贫民区”。

“鼓浪屿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

1998年，郑小瑛在鼓浪屿创办了厦门爱乐乐团，这个乐团如今已是厦门的一张名片。作为音乐家的她，认为在这里搞音乐根本不行。交通不方便，观众太少；诗人舒婷也抱怨如今住在鼓浪屿岛上生活很不方便，“现在西服都没法洗啊，整个岛上没人洗西服，你想，总共才洗三四件西服，谁会去开洗衣店？”家里的玻璃坏了，只需要简单地镶一下，但老两口却得搬到厦门去修，一路扛到轮渡，“哎呀，真是不方便”。

“鼓浪屿的本质，是一个社区，但现在它的本质在不断地衰败。”赵燕菁认为鼓浪屿的问题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有其深层次的原因所致。比如大量老房子的产权极其复杂，产权不明晰，很多房子不再是私人财产，没有任何保护维修，所有人都在恶性地使用。几百年都保护得好好的深宅大院，在三五十年里就衰败破落了。

在赵燕菁看来，厦门市政府每年在鼓浪屿上有上千万上亿的投资，这个岛可以说是厦门享受政府投资最多的地方。“路更好了，绿化更多了，路灯啊、水啊各个方面都比以前好了，它为什么衰落？因为它每一个细胞都在衰落。所以现在鼓浪屿的问题不是政府不花钱，而是在这种产权制度下面，它必然朝着这个路径发展。”

政府花了钱，外迁工厂、疏散人口、增加绿化。但一些业内人士却认为：长此以往，鼓浪屿有可能渐渐沦为普通的，只适于“一日游”的风景区。作为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给鼓浪屿所把的脉是悲观的。“鼓浪屿的整个衰落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从这个小岛上，能够折射出我们整个国家城市发展的集体问题。鼓浪屿的困境和北京老城区，和其他的历史名城一样，都在不可逆转地衰退，就是因为产权界定和政府公共收费的途径。”

一些城市专家将鼓浪屿定义为“典型的衰败型历史街区”，几十年累积起来的问题，根本不可能通过几个大工程来彻底改变面貌。赵燕菁和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院名城所所开出的药方是：

一、通过宣传型拍卖，逐步提升公众对鼓浪屿历史建筑的价值认识。保证新业主对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和维修。

二、逐步实现以房地产税或物业管理收费为主要财税来源。鼓浪屿今后如果要作为高档别墅区和度假区，就要建立相应的地产税和物业税制度，而不是单纯由政府输血。

2005年，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举办的评选中，鼓浪屿被选为“全国最美五大城区”之首，紧随其后的，是苏州老城区、澳门历史城区、北京什刹海、青岛八大关。

“这可以看出人们其实首先是把鼓浪屿当成特色社区，而不是观光景点。大家更认同的，是鼓浪屿作为现代城市的社会生活内涵的认同。”赵燕菁一直主张，鼓浪屿只有作为有人居住和使用的特色社区，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它的独特魅力才能长期得到保持。

“古建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它”——英国保护规划手册以这样一句话开头。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希望能够“盘活”老建筑，重建鼓浪屿的社区。在城市专家们看来，拯救鼓浪屿岛的方法，就是给那些老房子们找到合适的新主人，才能让岛上的历史风貌建筑重新焕发魅力和活力。

（陈艳涛）

网上预约售票实现景区限流

【新京报2017年7月19日】7月起，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始试行全部门票网络预售，并根据试行阶段运行情况，10月下旬起，择机正式实施全网售票，计划在2018年五一实现观众分时段、错峰参观，从而有效控制观众流量。

故宫“限流预约”的做法并非个例。拉萨的布达拉宫、敦煌莫高窟等多个著名的文物类的景区和自然风景区都已实现了网络预约购票制度。《旅游法》研究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韩玉灵指出，景区限流预约是对景区、游客的双保护，在保护景区文物和自然资源的同时，让游客获得更安全、更有尊严的游览体验，得到更好的精神享受。

故宫：不希望再现“日接待18万人次”的场面

一些景区人满为患，已经成了近年来节假日的常态。但一些景区宁可超负荷卖票，也不肯限制人流，更令无法再生的自然资源、文物受损。

2015年，国家旅游局颁布了《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要求各大景区核算出最大承载量，并制定游客流量控制预案。故宫经过测算，向社会公布其最大承载量为8万人次。

《旅游法》规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量控制方案，并可以采取门票预约等方式，对景区接待旅游者的数量进行控制。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景区应当提前公告并同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景区和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

韩玉灵表示，《旅游法》在景区承载量、门票预约、分流措施方面也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和说明。门票网上预约制度，保护了旅游者的权利。景区人满为患，留下了严重的安全事故隐患，特别容易发生踩踏等事故。为了游客有更好的、更安全的体验，景区实行流量控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有一个门票预约的制度。不要等到景区里面已经人满为患了，再去分流，这时候就很难分流了。“门票预约，避免游客去了以后再被‘分流’，把工作做到预防阶段。不要再让游客兴冲冲来了，却遗憾而归。”

从故宫到敦煌，从桂林山水到西湖断桥，都有过因人流过大而导致景物损坏的报道。通过限流预约，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韩玉灵指出，“一些景区的文物价值比较高，过多的人在里面流动，会对文物造成破坏，比如说敦煌的莫高窟，大量游人在莫高窟里的呼吸，都会对文物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也直言：“故宫不希望再现日接待18万人次、观众人挤人的场面。”未来，故宫还将考虑研究按时段设置不同档门票等方式，引导客流合理参观。

网络购票可以画出景区客流特征

据悉，通过实行实名制网络购票，景区可利用掌握的大数据，“画”出各区域的客流特征。这些大数据可以描绘出不同区域观众特征图。年轻人喜欢逛什么路线，什么区域吸引哪个省份客流最多。未来景区的展览也会根据

这些特征来办，让观众看得更过瘾，参观也更有序。

对景区管理者来说，旅游管理中面对的种种问题也急需大数据的帮忙。如何快速向游客推送景区各类信息，如何获知人流热度以便及时指挥调度，如何管理景区的景点、道路、设施相关数据，这些都是国内更多传统景区转型中亟须攻克的难点。基于大数据，可以帮助游客和景区绘制景区内精准的基础地图数据，帮助游客和景区进行拥堵、排队等人流、车流大数据采集。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表示，通过门票网络预约制，可控制游客进入景区的时段，进行流量控制，这是最直接的影响。而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数据，对游客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挖掘，更便于景区精细化管理。因为景区的网上平台一般都需要身份证实名预约。景区通过采集从PC端、手机端预约的游客信息，可以在票源分配上面做得更加合理。比方说，对于北京、上海地区，或者京津冀地区等游客来的机会比较多的地方，制定相应的门票发放、销售政策；对于远途的客人，通过这些游客的数据，可方便了解客源结构、来源地、年龄、甚至职业、收入情况等，对于特殊人群，可以做一些精准的营销，给予优惠政策，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更是一个新的趋势。

预约限流需要对特殊人群“照顾”吗？

对于全网预约售票制度，张凌云提出，中国的智能手机使用者在7亿多人左右，但是仍有几亿人还没有使用智能手机，还没有学会“扫二维码”，这几亿人一般多集中在偏远的西部地区，或者集中在中老年人群体里。对于远道而来的西部地区客人或者老年人，如果他们并不知晓网上预约制度，或者尚未掌握新的预订习惯，是不是也应该对这部分特殊人群做特别照顾呢？

“我认为景区在实行限流预约之前，应有一个缓冲期。或者说，像火车站、机场一样设置特别的值班窗口，为特殊需要者提供服务。”张凌云建议。“比如，可组织成立现场劝导组、调解室、应急处置小组，对只具备传统购票习惯又有参观需求的观众，进行购票流程讲解和分流劝导。有些老人不上网，但是好容易来一次景区，也应该更人性化地会给他放行。”

然而，采取限流措施后，部分游客可能会吃“闭门羹”、旅游无法成行。在两年前，却曾出现四川九寨沟、陕西华山等景区念在游客“远道而来”，不敢拒绝游客，从而造成了景区拥堵的局面。

韩玉灵认为，景区限流不是为难远路而来的游客，而是世界通行做法。很多国外的著名景点，都有限流举措。中国游客“网上预约参观”的习惯需要培养起来。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很多游客提前做了预约，但是由于飞机晚点等客观原因错过了进入的时间段，克里姆林宫也并不会为这些特殊游客“放行”。游客的预约习惯一旦培养起来，“预约分流”实施起来并没有想象中困难。

延伸：已实行和即将实行“限流预约”的部分国内景区

莫高窟：莫高窟现已全面实行网络实名预约购票制度和实名验票准入制度，并按照《旅游法》相关要求，执行单日最大游客承载量限额，网络预约门票每日限额发售6000张。在旅游旺季会适时启动超大客流应急预案。

布达拉宫：2017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游客参观西藏布达拉宫需提前一天预订门票。目前布达拉宫每天放出去的票有近5000张，其中，每家旅行社每天可以拿到7张布达拉宫门票；除了预订的团队票外，其余的门票，游客都可以通过现场预约和网上订票的方式获取。

八达岭长城：为做好长城保护工作，确保游览安全，今年10月中旬起，八达岭长城景区将实行限流措施。为提前做好准备，7月15日起，景区试运行网上预约售票，游客可以提前一周上网订票。

九寨沟：九寨沟目前每天限量4.2万人，一般淡季去问题不大，旺季建议提前网上订票，可以在九寨沟国际旅游网上面订票，订好后直接到景区刷身份证进景区，非常方便。

喀纳斯：门票限量，倡导预约。在旅游旺季，核心景区最多每天出售8000张门票。

稻城亚丁：在“十一”黄金周期间等旅游旺季，稻城亚丁景区对游客限流，景区门票全部通过网上预订。在2016年10月1日-10月7日，每天仅限制8150人进入。

黄果树景区：黄果树景区在旅游旺季实行景区极限容量控制。通过在线预约政策，景区提前预告接待量。当景区到达极限容量，停止销售当日门票，停止接待游客入园。

张家界：参观核心景区需网上预约。

（记者：张雪松）

扬州景区给共享单车“上规矩”

【新华报业交汇点2017年7月17日】瘦西湖景区是扬州的一张名片，近年来游客逐渐增多，一些游客和市民有了“开车怕堵，走路嫌累”的想法，共享单车的出现，给大家多了一种选择，可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对景区共享单车进行管理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扬州，也是全国景区都面临的问题。

交汇点记者今天在扬州市景区公安分局旅游警察大队采访获悉，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探索，扬州景区旅游警察在全国景区首创给共享单车“上规矩”的做法，探索出了“扬州模式”。

乱象多：共享单车在景区没疏堵反添堵

民警介绍，共享单车带来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乱停乱放，影响景区环境和形象。游客骑车到景区，把车子随处停放，方便了自己，却麻烦了别人，甚至给景区“添了堵”。乱停放的情况，特别是在景区出入口、人行道上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出来，不少人开始效仿。可是，乱停乱放仅仅是游客素质跟不上吗？也未必。

景区警方调研认为，单车运营商没有合理调度车辆，导致景区附近单车大量积压。另外，景区附近没有足够的车位支撑，造成游客将单车乱停乱放。还有一个原因是景区内的共享单车经常出现“潮汐效应”，即早上游客使用共享单车到达景区主要出入口，大量车辆堆积，在出园高峰时则恰恰相反，车辆向市区流动，景区一车难求。“潮汐效应”给景区带来的管理难题显而易见，高峰时段没能“疏堵”，反倒“添堵”，景区周围交通通行大受影响。

上规矩：组建“单车管理队”，红包鼓励游客规范停车

乱停乱放是共享单车带来的最大的管理问题，该如何解决？景区公安分局旅游警察大队开始了探索。

如果仅仅靠景区或者旅游警察管理共享单车，肯定应付不过来。所以，旅游警察大队要求各单车公司在景区周边增设“单车管理员”岗位，负责引导骑行者将单车停放在规定位置，将违停单车整理到规定的停放区，并检查各停放区的停车情况，及时通知单车公司进行调配，以免造成景区单车的积压。另外一大创新，就是警方协调景区及职能部门，在不影响交通、不占用

盲道的地方，树立明显的标示标牌，划出能停放50辆以上的停车区域，同时在不适合树立标示标牌的地方，在地面划出停车区域，并进行网格化管理。

在景区附近的公交换乘点和临时停车点划定区域，投放一定数量的共享单车，为换乘换线的游客增加一种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减少高峰期公交车运营的压力。第三个亮点就是协调单车运营商下放开锁的权限，让核心景区的外围保安使用，如果发现了影响景区秩序的单车，保安就可以使用这个权限，及时对单车开锁，移车到规定区域。

记者了解到，除此之外，旅游警察还建议单车运营商用“规范停车奖红包”取代免费骑行，以此来鼓励用户主动进行车辆的有序停放，只要将单车停放在规定的区域，就能得到红包。“我们通过引入红包停车机制，激发游客自觉骑车到景区规划停放区域，从而起到主动调度作用。”景区公安分局旅游警察大队负责人说。

有疑问：有的单车没导航边骑边找路隐患多，该咋办？

游客初次来旅游，对景区及周边的路线不熟悉，现有的单车APP没有导航功能，游客骑车找路，边走边看的现象比较多，增加了安全隐患，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针对这一问题，景区公安分局旅游警察大队建议单车公司，在其APP中加入一些热门景点的导航，并在单车上安装手机支架，为来景区旅游的外地游客提供更多的便利和引导，通过语音提示等方式方法引导游客骑车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当游客到达目的地单车落锁后，及时推送公安机关的温馨提示，让游客切实体验到人性化的旅游服务。

（记者：陈咏）

新闻摘要

赣闽携手保护“大武夷山”

【新华网2017年7月22日】提起武夷山，多数人会想到福建省，却不知

武夷山其实跨越赣闽两省。记者从江西省文化厅获悉，赣闽两省近日签署《武夷山世界遗产保护与利用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共同呵护“同一个武夷，同一个遗产”。

武夷山边界调整项目7月9日在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江西铅山境内的北武夷山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

据悉，两省相关部门将成立铅山武夷山世界遗产地管理办公室，配合立法机关出台《江西铅山武夷山世界遗产地条例》，编制世界遗产地保护规划；同时创建“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警—即时处理”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模式，让遗产地的生态保护永恒持续。

铅山武夷山也入了世遗名录，“边界调整”是怎么回事？

武夷山1999年被批准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是我国第四个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也是距今最近入选的一个。其他三个分别是泰山、黄山和峨眉山-乐山大佛，分别于1987年、1990年和1996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据悉，此次武夷山边界调整，是将原来划在福建和江西省界的山脊线的范围扩大，将位于江西上饶的铅山划进了遗产区范围内。

其实，武夷山横跨闽赣两省，介于江西的上饶、铅山与福建的浦城、崇安等地之间。

据澎湃新闻报道，此次获得通过的铅山武夷山遗产提名地位于铅山县、武夷山脉北部，面积107.25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67.47平方公里），是江西省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其中黄岗山位于铅山县武夷山镇境内，是武夷山脉最高峰，也是整个华东六省一市地区的最高山峰，最高峰海拔2160.8米，为大陆东南第一峰，号称“华东屋脊”“武夷支柱”。

这次边界调整新增的武夷山北部区域地形更加陡峭，气候更加寒冷，生态环境更加原始和自然。专家表示，调整后的遗产地更加完整地展现了武夷山作为中国东南部亚热带山区代表的突出普遍价值。

丽江、三江并流等也进行过边界调整

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规定，世界遗产大会每年审查的申报数目不超过45个，其中包括往届会议推迟审议的项目、再审项目、扩展项目（遗产限制的细微变动除外）、跨界项目和系列项目。

据了解，此次铅山武夷山项目属于遗产限制的细微变动。操作指南规定，轻微变动是指对遗产的范围及对其突出普遍价值影响不大的改动。

此前，我国世界遗产已经不止一次进行过边界调整。

2012年，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了丽江古城微小边界调整和缓冲区的提议，将丽江古城面积由3.8平方公里调整到7.279平方公里。

2010年，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云南三江并流保护区边界细化方案被表决通过。

如果世界遗产范围修改过大，就构成了扩展项目。扩展项目要接受周期为一年半的评估，并且占用大会规定的每年45个申报项目的名额。

例如，云南石林、贵州荔波、重庆武隆组成第一期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于2007年6月27日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入选世界自然遗产。2014年，广西桂林、贵州施秉、重庆金佛山和广西环江组成“中国南方喀斯特二期”项目作为对“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扩展，也入选了世界自然遗产。

无论是边界细微调整还是扩展，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产。此次武夷山遗产地边界调整，进一步加强了遗产地自然价值的完整性，将大大加强对遗产地的保护。

（袁慧晶、倪伟）

法开署贷款项目实施 助力仙居国家公园建设

【中新网2017年7月17日】17日，记者从浙江省财政厅了解到，浙江省首个法国开发署（以下简称“法开署”）贷款项目——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已经进入正式实施阶段。该项目是2016年中国贷款额度最大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总投资12.4亿元（人民币），利用法开署贷款7500万（欧元），贷款期限为20年。

2016年12月16日，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利用示范工程项目获得法开署董事会的批准。2017年7月12日，该项目完成了由中国财政部和法开署签署的《贷款协议》，标志着项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

记者了解到，法开署是一家法国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共金融机构，代表法

国政府致力于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进行合作。其主要业务目标为：减少城市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支持城市低碳可持续发展，鼓励清洁能源的生产，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

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利用示范工程项目将在法开署的贷款帮助下，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公园管理模式，探索形成具有浙江台州仙居本土特色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公园发展模式，推动县域范围的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

据悉，仙居县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利用示范工程项目由自然遗产保护工程、生态修复工程、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等八部分内容构成，涉及建设用地41166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88180平方米，新建索道2条，长度约3500米，新建游步道约23公里，隧道提升改造约18公里，以及其他基础设施。

（见习记者：胡哲斐）

社会纵横

智慧旅游带给我们哪些全新体验？

【北京晚报2017年7月18日】近两年，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完美融入旅游领域，游客戴上VR眼镜，仿若畅游世界各地，周遭是原生态美景，抬头见蓝天白云，回头还能一瞥路人温暖的笑……这就是智慧旅游带给人们的曼妙享受，我们只需要戴上相关智能设备，就能得到近乎真实的体验。

专家指出，如今智慧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未来的智慧旅游会依托更为成熟的技术，带给人们无限的想象。

智慧旅游有哪些“黑科技”？

虚拟游系统：你有没有想象过一场宅在家里的旅行？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窗外传来清脆的鸟啼声，我们坐在家里沙发上，体验到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或者为自己制定一份旅游攻略，提前计划好居住的酒店、每个景点所花费的时间等。这就是如今最火的VR虚拟现实技

术，甚至可以为游客画出一个在家就可以观赏游览的“VR全景+智慧景区蓝图”，足不出户就将天下美景尽收眼底。

虚拟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声色并茂增加我们的带入感，让我们有着身临其境的别样体验。

生物识别技术：你有没有想象过未来的景区是何模样？

未来的景区可能会没有工作人员，没有售票处等等，我们“刷脸”就能进入景区，“刷脸”即可购物支付，游览全程有无所不知的自助导游解说耳机陪伴，随时随地发送信息就可以获得图文详尽的旅游资料，真正实现自在畅游景区。

中国智慧旅游产业联盟秘书长蒋骏介绍，近年来，生物识别技术与旅游业的融合也越来越强，主要体现在景区电子门票系统。这主要利用RFID电子标签技术来现实，具有电脑售票、验票、查询、汇总等门票控制管理功能。游客可以快速验票，快捷消费，减少服务环节，提升游客体验，很好地满足游客一票在手走遍景区的需求。

智能导览系统：你有没有想象过有“御用”导游陪伴的旅行呢？

当进入游览景区环节，景区智能导览系统将发挥它的巨大魅力。游客只需租用一台自助导游解说耳机，便可一边游览景区，一边享受全程自动讲解服务。这解决了以前人工导游讲解费力且效果不佳的问题，同时也让游客更好地游览景区。

客流分析系统：你有没有想象过随时随地知晓景区哪里人最少？

在景区客流监控方面，景区借助智慧旅游对游客在景区内的流动特征、消费习惯等进行科学地计量分析，更好地引导游客的空间流向。甚至游客自身就可以根据智慧旅游的终端设备，得到景区内客流分布实时信息，自主调整游览线路。

蒋骏指出，“智慧景区”是旅游景区未来的发展之路，将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未来旅游体验。一方面有效提升了景区的运营能力与办事效率，助力景区内部管理标准化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满足了游客个性化、信息化服务的需要，满足了游客自在畅游景区的想象。

智慧旅游是发展“未来旅游”的重要方式

从2010年开始，各地城市就开始正式建设和开发智慧旅游。蒋骏表示，

“根据智慧旅游这七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它发展时间还很短，但取得的效果十分显著，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智慧旅游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缺乏协作能力。全国范围内的智慧旅游还没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容易造成各地城市在开发智慧旅游时出现设计错位的现象，导致很多系统都不能够协同工作，大大降低了智慧旅游本身的价值；第二，智力支持不足。所谓智力支持不足主要是指技术能力的不足和人才的缺乏。蒋骏建议，相关部门应该着重发展和完善各类有线技术以及无线技术，使智慧旅游成为人们未来重要的旅游形式。

业内人士指出，整体来讲，国内智慧旅游发展处于良好态势，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由于发展时间还较短，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很多环节还存在着缺陷，需要政府、企业和游客的共同努力来解决，从而促进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更多便利。

近年来，游客对高品质旅游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市场提供多元化、人性化的选择，而“智慧旅游”正是旅游行业加快“互联网+”、发展“未来旅游”的重要方式，更是行业的发展趋势。在蒋骏看来，“未来的智慧旅游会依托更为成熟的技术，带给人们无限的想象。智慧旅游行业的未来是不可估量的。”

（阳叶萍）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双刃剑

【中国文化报2017年7月15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已成为各地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但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使旅游开发和名城保护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如何通过旅游传承并保护好历史文化？如何避免旅游开发大潮对于历史文化名城的冲击？有关专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保护是根，开发是果

保护和开发是历史名城可持续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对矛盾，可以说，保护基本上是对开发的一种抗衡，其中细化如城市现代化与保护如何协调、更

新与保护的关系等都是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旅游业时所要面对的问题。

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西城区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是古都北京的发祥地，皇城文化、仕子文化、民俗文化等高度聚集。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西城区有A级旅游景区21个，有什刹海、大栅栏等18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8项。

近年来，西城区为了保护旧城传统格局，他们坚持不改变胡同肌理和传统风貌的理念，统筹推进大栅栏、白塔寺、什刹海、天桥北等历史地区的整体保护和功能疏解，积极探索渐进式旧城街区保护模式，营造了开放、多元、包容、共生的城市文化环境。

西城区什刹海研究会学术顾问、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李庚介绍道，当前什刹海就是走的“活化”历史文化名城的道路，可作为一个比较正面的借鉴案例。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开发，不仅要保护建筑遗址本身，还要保护它的生态，这是前提。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世仁表示，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保护是根，开发利用是果，没有保护，就谈不上利用。

避免超载，推动可持续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旅游开发间的主要矛盾存在以下几种：旅游城市化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造成旅游资源的破坏，不断蚕食和破坏风景名胜区；城市环境质量下降，旅游环境和景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现代城市景观与旅游整体环境不协调。面对这些问题，专家给出了一些建议。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魏小安表示，当前情况下，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向文化城市休闲度假方向发展。对于旅游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压力，某些景点可采取提升景区价格，从而达到减量的目的。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张辉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除了通过价格减少游客之外，还可以通过预约制以及旅游季节差来调整。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任万平也谈道，目前故宫正在进行预约制的探讨，这是一种缓解人数压力的有力举措。

如何保护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不被破坏是政府要完成的大布局。“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也做得很好，政府有监控，发布景点承载压力预报。”李庚表

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可以从主动和被动两个层面来进行。被动保护如上文所述的提价等方式，主动保护则是按照国际惯例，针对景点的脆弱程度进行保护，减少景点的灯光污染，驱除低级商业业态，让游客住下来，体验深起来，这是文化旅游的终极目标。

专家们认为，旅游开发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应该是由点到面、由散到整、由分到合的大变革，只有实施保护性建设，彰显个性品质，避免超载开发，推动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改变粗放型发展格局，实施全新的开发战略，才能保证旅游业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将历史文化名城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旅游产品，使其不断折射出文化智慧的光彩，赋予旅游产品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历史文化名城呈现真实生动的文化氛围。

（记者：裴秋菊）

时事评论

世界遗产，如何善待？

【央视网2017年7月11日】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特征鲜明、分布宽广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自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大量反映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利用，历史上因各种原因遭到不断蚕食、破坏的环境景观得以整治，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保护意识和保护理念获得了广泛理解和认同。

同时，世界遗产在反哺遗产地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也发挥出重要作用，不仅提高了遗产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改善了生活环境，还以多种方式增加了当地民众和政府经济收益，提供了遗产保护、管理、旅游等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这是申遗带给国家和人民实实在在的变化。

申遗成功可喜可贺，但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要以平和、冷静的心

态看待，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申遗成功后的管理、保护和传承上。必须看到，与其他一些世界遗产大国相比，我国在遗产保护、法规建设、文物安全、人才培养等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监管、保护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有些还很突出。

其中，最受诟病的便是一些地方将世界遗产当成“摇钱树”，进行过度的商业包装和开发。这通常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世界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自然价值遭到商业入侵和破坏；二是公众共享世界遗产的门槛被人为提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门票经济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相对于世界遗产数量，我们更应该关注世界遗产的保护责任与义务。这是中国政府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的庄严承诺，也是成为与世界遗产数量相符的世界遗产强国的必然要求。

这次可可西里申遗，强调是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纯净生态而非发展旅游；鼓浪屿申遗，提出合理控制登岛游客数量、改善遗产本体保护状况、提升监测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申遗的正确出发点，高度契合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对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不过，申遗成功将不可避免带给遗产地更多的游客和更大的负荷。或许一些地方从申遗成功看到的只是满满商机，一不小心就会犯下功利主义的错误，以杀鸡取卵的方式打开大门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即便超过遗产地的最大承载能力也在所不惜。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少前车之鉴，但愿可可西里和鼓浪屿能守住世界遗产的“本心”，进一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强化对遗产价值的传承，而不是简单沦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工具。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突出的普遍价值”作为评选世界遗产的主要依据，如何保护这种超越国家界限的普遍价值，使之有益于全人类的当下和未来，是我们更应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保护措施愈发严格，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申遗成功不是最终目的。在保护世界遗产上，我们还有不少路要走。首要的就是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不把申遗成功作为“政绩”标榜，逐渐改变“重申报、轻管理”的行为逻辑，想办

法将我们已拥有的世界遗产保护好，尽快提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整体水平。同时，要加大世界遗产领域的国际交流，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深度合作，既把中国最丰富的基因库和最具悠久文化的代表作推向世界，又可以学习先进的世界遗产保护新理念、新做法、新案例，使中国的世界遗产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国家，中国未来必将不断有自然或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名单必然会不断拉长，而我们肩上的责任和义务也将更加沉重。我们要深知申遗成功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应更多思考对遗产的保护和对遗产文化价值的传承，如何善待文化遗产，真正让世界遗产留下来、“活”起来。

(<http://tv.cctv.com/2017/07/11/VIDEJVCeJL7YnbLbGvMbZcLo170711.shtml>)

建立“国家公园”会遇上哪些难题？

【中青在线2017年7月25日】日前，《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获审议通过。媒体报道称，试点方案的通过或可以以“极速”形容，从提出构想到审议通过不足半年时间，足见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之紧迫性。

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2729处，此外还建立了国家地质公园240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25个、国家级森林公园779个、国家湿地公园429个，分属林业、环保、国土、农业、水利、海洋等部门。这些保护地的规划建立过程，几乎每个都有利益博弈的影子。

在读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提起一个案例，西南某省一个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也是风景名胜区，因为在具体的管理权上面争夺，旅游、环保、林业等部门抢得一塌糊涂，甚至闹到动武的地步。林业部门因为有林业公安的强势，最终获胜。

更多见的情况则是，有些地方，一块地方，挂了几块牌子，从保护区到

风景名胜区、国家公园。适用什么样的管理标准，很难把握。

这种局面要不要改？要改。但是，肯定不是可以靠改一个名字，或者把一堆名字收拢到一处就能行的。“一窝蜂上马”、改名，实际上只能是换汤不换药。保护与开发的冲突，也不是今天才存在，更不是因为保护地的名目众多而造成的。

我参加工作后，最早负责并执笔的是羌塘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后来在国家林业局看到很多自然保护区规划文本，包括后来负责完成的几个湿地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

这些不同名目规划所体现的不同保护地的功能、分区、设计甚至预算，都是大同小异，除了个别纯粹的旅游区，几乎连总规的篇目格式都可以直接拷贝。没有哪个保护地，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国家森林公园，不试图在“保护”与“开发”这两个矛盾中做到平衡。

这不仅是因为相关文本规范很接近，也是一种必然：在中国，值得开发、值得观赏的自然景观，很少不需要在自然生态上予以保护；与此同时，在任何需要保护的地方，又很少有面临开发压力或诱惑的。

在名义上保护级别最为严格的自然保护区，规划文本中也有专门的旅游开发章节，甚至会列入部分经费预算。而在哪怕最为开放的森林公园，也会列入相关的保护内容。

目前中国不同保护地之间的管理，主要是度的区分。保护地类型的多样性，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在最大范围内，覆盖不同保护需要层级的对象，本身不应该是改革对象。

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政出多门，“九龙治水”。目前的改革试点模式，是比较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些体制改革，本身都是顶层设计范畴，比如说，同地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协调议事，之前在政府机构内部即有相应机制，运行多年。

在具体问题上，既有跨部门协调机制是否有效，如果无效，可以有怎样的创新？这种体制创新，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参照由各地区深改小组直接介入？更大的跨省区合作协调，之前无法协调好，之后靠什么形式的创新协调？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地方部门能撬动的。

对于基层执行者来说，具体的实体（国家公园）很容易把握，最高的理

想也很容易理解，但恰恰是中间这段制度创新，既非他们强项，也不一定有清晰认识。这大约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铺开甚速而深化较缓的原因。

目前国家公园体制总体的改革思路，是超越部门利益，通过更高的统一决策节点予以管理。某种程度上，是管理权力的上交和集中。这似乎也是国际保护地管理的一个趋势。

中国现有的保护地管理模式，渊源有二，一苏一美。

从俄罗斯来看，其继承了苏联的自然保护管理体制并加以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包括设立“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作为“专门环境保护领导机构”进行国家管理，通过设立专门环境管理机构，把专门管理机构和协调机构合而为一，减少了管理部门过多，办事效率和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

美国国家公园也算中央集权型管理体制，由联邦政府内政部下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主导管理工作，形成以“国家公园管理局—地方办公室—基层管理局”为主线的垂直管理体系，地方政府无权介入。有关国家公园的政策和法律条款则由社会各界向美国国会发起提案，提案通过后即成立。

不过，仅仅是将管理的权限集中与上交，也不足以称为创新。比如在相关部门之上，没有一个更有力更全面的管理环节吗？也是有的。

进一步推演，当年一些地方的保护区或林区，是与当地政府几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保护机构“统管”到这种地步，不仅管自然，还管人管社会，按理应该效果更好了吧？也不一定。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在保护区里开矿，更难被发现处理。

“九龙治水”只是形式，任何一种保护地管理体制的特点，都取决于其功能设定和背后利益相关方。内在问题没改变，即使管理权上交统管，但由于仍然要顾及相关利益，“政出一门”后系统风险反而会扩大。

中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以建立国家公园为改革推手，完善我国保护区体系，解决目前的地域分割、部门分治，“多龙治水”的难题。

所谓体制创新，既要有自己的新办法，也不应排斥别人的老办法。但要做到别人的老办法不是形式上照搬，就需要充分考虑国情的不同。

以美国为例。首先，美国社会在保护地管理上，容纳多种所有权机制，包括私人领地保护。

与之对应，在中国，几乎所有自然保护都要政府来管。

其次，美国的国家公园不以营利为目的。美国国家公园每年游客量达2.5亿至3亿人次，门票收入却不到1亿美元，也就是说每人每年仅花费40美分（约合人民币2元6角）。

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费来源于国会拨款，国家公园管理局从不给各个公园下达创收指标，以防止公园借口搞开发项目。在中国，这就属于政府包办，不仅管事，还要出钱。又是老问题。

最后，美国关于国家公园以及其他保护地的立法相当多，而中国至今寥寥无几。这些法律当然是超然于管理机构或组织之上的。由于普遍的执法环境差异，在中国，即便是现有的也难以认真执行。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法定管理机制简单，造成执法刚性不足；另一方面，执法普遍难以落实，又使保护管理容易走偏。其实在国家公园之外，美国保护地管理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可能比中国更强。但由于首先保证了在组织之外有法律作为“最高限制”，也就减少了人为因素造成的混乱和弊病。

国家公园管理，也有赖于成熟的社会自我组织和管理，以及全社会包括公共舆论的监督。像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种情况，在多年前纸媒最为活跃、赋予的监督职能相对更充分的时期，可能遇到的舆论压力会更大，更早，甚至不至于到难以收拾才收手。

开发与保护，收权与放权，在自然保护中乃至更多领域，都是老问题，体现就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一头独大增加管理系统性风险，“多龙治水”降低效率……

这样看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还真不是一个小的技术问题，配得上“改革”这个大题目。它甚至是中国改革一个具体而微的全息缩影。

从其他国家相对成熟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来看，集中垂直的管理固然不可少，但与之配套的是非营利定位甚至公益定位，组织系统之上有超然刚性的法律限制，社会监督的普遍深入。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特别强调：“试点的并非国家公园这一实体，而是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应该也是为了避免“国家公园一窝蜂上马”，徒有虚名与器物，遗漏制度与思想。

（宋金波）

IUCN研究表明非法捕杀等活动威胁世界自然遗产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2017年7月5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认为非法捕鱼、乱砍滥伐和非法盗猎等活动正在影响全球57个自然遗产保护区，而其中19个全球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正遭受严重威胁。

前不久在波兰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IUCN建议把墨西哥群岛和加利福尼亚湾保护区纳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并特别提出，要关注乱砍滥伐和非法盗猎给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造成的不良影响。

IUCN总干事尹格尔·安德森（Inger Andersen）认为全球自然遗产面临非法人类活动的威胁，这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同时他认为，世界遗产保护区是全球独特且最有价值，特别需要保护的区域。对大自然和全人类而言，自然遗产一旦消失，将不复存在。此外，国际社会有责任采取行动进行保护。只有通过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才能减少非法活动对世界遗产地的影响，更有效地保护世界自然遗产。

同时，IUCN主张对世界遗产保护区实行监控，在世界遗产保护区开展物种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利于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编译：Edward）

古今辉映的“世遗”之城——克拉科夫

【人民日报2017年7月23日】日前，鼓浪屿与可可西里正式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引发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而第四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举办地——波兰的克拉科夫市，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提起波兰，多数人会想到华沙，这座历经战火洗礼、体现波兰人民不屈反抗精神的首都，对克拉科夫却感到陌生，为何由它来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其实，克拉科夫是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波兰城市，是一

座原汁原味的“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同时，它也是一座宜居的现代之城，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魅力，值得我们去探究，去体会。

克拉科夫历史悠久，荣光璀璨。早在11世纪皮亚斯特王朝统一波兰时，它就被立为首都。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已发展成为欧洲东部最繁华强大的国家，克拉科夫也随之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文化与贸易中心。15世纪，波兰进入历史全盛期，克拉科夫随之成为全波兰第一个全面开放对欧洲犹太人经商政策的城市，与布拉格和维也纳并称当时的欧洲三大文化中心。

16世纪中期，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二世与邻国立陶宛合并成立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由于国土北扩，克拉科夫作为首都，地理位置过于偏南，因此在1609年，齐格蒙特三世国王迁都至华沙。

虽然不再是首都的克拉科夫发展遭遇停滞，但也在随后数次亡国与复国的循环中幸免于难，成为波兰少数“完全没有被战争摧毁的地方”之一。这里有波兰最古老的教堂、雅盖隆王朝的宫殿、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广场以及培养过哥白尼的欧洲古老大学。这些都是波兰辉煌的历史象征，也是波兰政府如今努力打造的城市名片。

克拉科夫古城风光怡人，历史底蕴丰富。进入老城区，最吸引目光的就是维斯瓦河畔高地的华丽建筑群——瓦维尔城堡，这是古波兰历代国王的宫殿，保存得非常完整，四周筑有古堡式围墙，内部建筑兼具古罗马与文艺复兴等时期的风格特点。毗邻城堡的瓦维尔教堂是波兰举行国王加冕的地方，历史上多名君主和“大人物”也安葬于此，如保罗二世教皇、著名诗人密茨凯维奇、民族英雄毕苏茨基等人的灵柩也安放在这里。

老城中心的中央广场始建于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最大的古代集市广场。广场东北角是圣玛利亚大教堂，始建于1355年，堪称波兰哥特式建筑典范，据称是欧洲最大的红砖教堂，从14世纪至今，每隔一小时就会有一名号手在高塔上吹响号角进行报时。在老城，随处可见历史名人雕塑、马车与古书店，使人远离现代社会的喧哗，仿佛漫步在中世纪的古城。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城，克拉科夫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古城规划和谐统一，大大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老城被拔地而起的新城包裹在中间，汽车禁止入内，人们只有乘坐马车才能在古城穿行。一路走来，从现代化到古罗马风格的建筑矗立路旁，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虽然这样的

规划增加了新城区的交通压力，但也使得克拉科夫老城作为中世纪欧洲首都城市的样板得以完整保存。

不同于一些古城，克拉科夫老城在当下不仅作为旅游资源存在，原有的古建筑，如艺术馆、政府机构、大学校区等至今仍然发挥着城市公共资源的现实功效。每当波兰传统节日到来时，城中心广场与纺织会馆仍然继续承担古老的民间集市功能，这种传统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人们踊跃参与，不但烘托了节日气氛，也自然而然地向游客们传递出波兰的传统文化魅力。

可以说，克拉科夫人生活、工作、居住在新城，聚会、休闲、娱乐在老城，历史街区与现代化都市和谐共存，或许这才是这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的真正魅力。

（孙博）

柬千年古迹三波坡雷古入遗 游客大增

【联合早报2017年7月18日】柬埔寨中部磅同省三波坡雷古千年古迹最近被列为世界遗产之后，马上引发猎奇效应，那里的游客随即多了起来。

三波坡雷古（Sambor Prei Kuk）位于金边以北206公里外磅同省（Kampong Thom）的森林里，“三波坡雷古”是高棉语，意为“丛林中的寺庙”，占地25平方公里，是柬埔寨前吴哥时期最重要的古寺。

那里是6世纪末至7世纪初真腊王国的首都伊奢那补罗（Ishanapura）所在地，迄今可见的寺庙尚存百余座，其中52座依然矗立。

柬埔寨当局8日宣布三波坡雷古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批通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据资料，三波坡雷古中有10座八角形的庙宇具有东南亚其他类似寺庙所没有的独特特征。其砂岩建筑装饰是吴哥时代以前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即所谓的三波坡雷古风格。

上周，到这个千年古迹的游客明显增加，周末的人潮更多。从1994年起就在那里当守卫的森诺姆说：“它现在是世界遗产了，希望我们可以因此受益。我真的很感谢祖先建了它留给我们。”

柬埔寨游人乌兹斯雷说：“更多（外国）游客到来之后，人们就可以有

更多收入，我们的小孩也有机会学英语了。”

三波坡雷古是柬埔寨第三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

建于12世纪的吴哥窟于1992年列遗，11世纪兴建于柬泰边界的柏威夏寺2008年入册。

其中，以吴哥窟的名气最大，几乎成了柬埔寨的代名词，是每个到柬埔寨的外国游客必到之处，然而，此前三波坡雷古这个早于吴哥时代的高棉文明摇篮却是鲜为人知。

据统计，去年柬埔寨的入境旅客增长了5%，达到500万人次，预料今年可增加至550万。

(<http://www.zaobao.com/znews/sea/story20170718-779827>)

环球博览

让人回归和体验自然——德国国家公园扫描

【光明日报2017年7月22日】德国国家公园风景秀丽。16个国家公园中，从一亿年前的白垩纪遗迹到广袤秀美的田园，从漫长的海滩到茂密的黑森林，可谓奇景交融，各有特色。这些国家公园不仅给人们提供了自然风光，同时也起着保护珍稀动植物、维护自然种群的作用。国家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为游人深度体验设立便利设施，提升了公众的环保意识。

涵盖多样宝贵的自然资源

欧洲最早建立国家公园的是1909年的瑞典和1914年的瑞士。德国在建立国家公园方面相对较晚，1970年才有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在国家公园创立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德国政府根据地理环境和生态分布，创设的国家公园包含了海滩和海洋、山地森林、湿地、高山流石滩和高山草甸以及各类野生动物和远古遗迹等不同主打资源和环境特色。

国家公园主要分布在德国国境线和曾经的东西德交界处，这些区域往往人烟稀少，大自然受人类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迄今，德国16个国家公园

的总面积达到7000多平方公里，超过国土面积的2%。面积最大的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北海浅滩国家公园，达441000公顷，最小的是波罗的海吕根岛上的雅斯蒙德国家公园，那里有著名的白垩岩。

有学者将40余年的德国国家公园发展历史划分为1971-1989年、1990-1995年、1996年至今3个阶段。其中，1971-1989年为早期建立阶段，随着20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环境意识觉醒，保护自然和环境的重要性逐步得到认识，这一时期西德成立了4个国家公园。1990-1995年为东西德国统一阶段，1990年东西德国统一，很快成立了6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规模得以快速提升。1995年之后，国家公园重新进入缓慢发展阶段，至2016年共建立了6个。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16个联邦州基本上每州有一个国家公园，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负责国家自然保护工作。其中，联邦政府负责制定自然保护的宏观政策、国家公园相关法规；州政府负责具体的自然保护工作，决定国家公园的建立、具体管理等事务，拥有国家公园的最高管理权。虽然国家公园由地方自治管理，但是各州之间、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政府机构与非政府机构之间，联系密切，建立了国家公园管理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共商国家公园的管理问题。德国国家公园着眼于保护自然，基本原则是“让自然成为自然”。

“自然与体验”的建园理念

可以在人口稠密地区再造森林吗？当1970年德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落成时，环保人士这样问，因为距离森林不远就是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

巴伐利亚森林坐落于德国和捷克边界地区，与捷克的苏马瓦国家公园连成一片，成为欧洲最大的森林保护区。作为中欧地区最大的未被破坏的保护区域，这里是一派广阔、原始的森林荒野景观。事实上，国家公园建立以来，城市与森林和谐相处的局面在此形成。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拥有大片云杉森林、野生林间小溪和开阔的泥泽地带，为游客提供了约300公里远足路径和200公里自行车道。该国家公园奉行“还自然以自然”的保护理念，不进行人为干预，而是让此处的生态系统自由发展运行。无论是徒步、骑行还是在长达80公里的越野滑雪道上驰骋；

无论冬夏，游人都有大量机会欣赏公园的美丽。

不难看出，德国国家公园强调最大尺度地保护荒野，并侧重对自然过程的保护。德国国家公园资深专家、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园长卡尔辛那指出，荒野对于德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且在于为公众提供了体验完全自然的机会，人们可以在这里体验冒险、神话、童话世界，感受野性之美和自然的力量。

其实，不同的德国国家公园，受地形和纬度的影响，风光千差万别，体验各有千秋。

波罗的海的吕根岛以陡峭的悬崖著称。在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的画作中，早已对岛上的雅斯蒙德国家公园中魅力独特的白垩岩景观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百年桦木林、白垩岩和陡峭悬崖，都是雅斯蒙德国家公园的特色。

莫里茨国家公园包含了梅克伦堡一部分湖区。园区内有着几乎保持完整的沼泽森林，100多个湖泊栖息了许多珍稀鸟类，例如鹰鱼和海雕等稀有物种。

在萨克森小瑞士森林公园，150年以来，因为天然岩壁十分适合攀岩，该公园深受攀岩爱好者的喜爱。远足的人们也可以借助阶梯登上一些山峰的顶端，从高处体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这得益于德国国家公园在维护和运营过程中高度重视“自然与体验”相结合的理念。例如，位于德国图灵根州的海尼希国家公园，始建于1997年12月31日，面积75平方公里，201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该国家公园游览路线的各个休息点都通过游戏方式介绍园内动植物世界的一些奇闻趣事。例如，在希尔伯峰体验路途中，游客可以试试能否辨别出多彩铃蟾的叫声；在布伦谷体验路途中，游客可以试试能否抬起各种木材，估测一下它们有多重。吸引儿童游客的一个特殊景点是“野猫儿童森林”，喜爱森林的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玩耍，爱好冒险并且勇敢的孩子还可以去一个木制森林娱乐场所游玩。

用法制机制管好国家公园

自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展后，德国先后推出一系列环境立法，包括1972年的《垃圾处理法》、1974年的《控制大气排放法》、1976年的

《控制水污染防治法》、1983年的《控制燃烧污染法》等，这些立法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法治保障。

德国是欧洲最大经济体，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为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提供了资金保障。例如，德国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有7000多种动物处于危险甚至濒临灭绝状态，联邦政府在2007年提出了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2013年起德国每年拿出5亿欧元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这为国家公园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在联邦政府层面，负责国家公园事务的机构为德国环保部及其下属联邦自然保护局。联邦主管机构主要从框架制定、服务、引导的角度出发开展工作，并不对国家公园进行直接管理。例如，联邦政府制定的《森林法》规定，森林所有者无权拒绝游人入林，即使是私有林，公众也可以随意进入，这就保证了步行者可以在恬静的森林里悠闲地娱乐和享受自然。

在州政府层面，主要是为每一个国家公园立法，依法指定州一级的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由该主管部门依法组建国家公园直接管理机构，并负责国家公园规划审批。基于公益性考虑，国家公园均不收门票，采取收支两条线，保护管理费用由州政府承担。

此外，国家公园专门设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即国家公园顾问委员会。委员会由州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牵头，成员来自各组成机构，包括农业、林业、环境、交通等领域的联邦政府部门、州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成员还来自相关协会，如森林业主协会、旅游协会、锯木厂和木材工业协会、农民协会等；当然还有科研机构代表。专家委员会通过举行专题会议，为国家公园相关事务提供专业建议。专家委员会制度为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公园管理、协调利益提供了平台，同时保证了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的主导地位。

此外，国家公园地方政府委员会是州一级层面的主要责任方，由国家公园所在地方的市长、县长组成，参与国家公园的规划、年度计划、游客和交通管理等政策制定。各辖区内如有任何项目可能会影响国家公园，应及时告知地方委员会。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至少一年一次。如果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地方委员会间出现意见不一致，可以报州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由其进行仲裁。

地方政府委员会制度协调了国家公园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地方政府参与国家公园事务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为国家公园管理局参与地方事务提供了平台，并且保证了国家公园主管部门的主导地位，有利于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

经济效益和自然保护的双赢

由于德国把国家公园的经营目标定位在以生态社会效益为主，因此国家公园的经营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统一安排，经营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政府投入。除了州政府的财政投入外，国家公园还可接受社会捐赠，利用公园资源获取收入。

国家公园需要州财政支持，同时也给各州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局在200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德国14个国家公园每年吸引游客共5100万人次，创造了近21亿欧元价值，相当于创造了69000个就业岗位。

例如，海尼希国家公园建立后，当地游客数量从1999年的5万人发展到2007年的40万人。维尔茨堡大学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每年吸引76万名游客，创造的价值相当于提供939个全职岗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比例。

根据调查统计，近一半的游客为体验原始自然而来，他们不经意间带动了旅游保护地的经济，可谓“无心插柳”，一举两得。

（记者：田园）

编 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网 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电 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 真：010-88315325（F）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张 立 陈 晨

邮 编：100044
